

女性主义文论史上的扛鼎之作

——写于《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象》中译本面世之际

张冬梅

关键词：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主义

DOI: 10.13277/j.cnki.jcwu.2016.01.017

收稿日期：2015-12-30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6)01-0119-03

作者简介：张冬梅，女，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讲师，南京师范大学201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女性文学。210044

《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象》^[1]（以下简称《阁》著）这部在女性学界久享盛誉、影响深远的著作。由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D. Gubar）两位美国学者合作撰写。该著问世当年，即在美国普利策奖和美国书评奖的竞争中荣居第二。吉尔伯特和古芭也被公认为20世纪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

《阁》著是杨莉馨教授凭借多年深厚的学术积累和扎实的英文功底，历时数年潜心译出的又一心血之作。

《阁》著常被誉为20世纪晚期美国最具变革力量、影响最为深远的三部文学批评著作之一。“正如赛义德之于后殖民书写，塞奇威克之于同性恋研究，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为女性主义文论引进了一个术语、一个方法论和一个理论”。^[2]不同于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着重分析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亦不同于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注重对“史”的搜集与论证，《阁》著以独特的女性视角，运用精神分析等现代批评理论和意象研究的方法，以振聋发聩的思想力度和严密而富于逻辑的分析，深刻发掘19世纪英美女性作家及其作品背后的意义，精辟地解读了“阁楼上的疯女人”与“家庭的天使”这对相互交错、紧密呼应的矛盾体，猛烈地抨击了男权文化带给女性作家个人及其创作的

精神束缚与歧视。其中，许多文本分析已经同其分析的诸多文学作品一样，早已成为文本解读的经典佳作，其影响深远而广阔。

《阁》著按照“禁锢—作者身份的焦虑—应对策略”这一基本路径，对横跨整个19世纪的英美女性作家及作品展开论述。第一部分《走向女性主义诗学》先是列举了西方历史上一些著名文论家表现出的性别歧视意识，指出了诸多男性作家反复出现的“天使”与“疯女人”两种极端化的女性形象，然后在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的基础上提出了女性作家的“作者身份焦虑”说，指出女性作家不仅受限于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而且被禁锢在男性作家建构的艺术殿堂与小说大厦之中，她们担心自己无法创作，且忧虑自己再怎么也无法成为“前辈”，自己的写作行为将极为孤立，自己也将因此而遭毁灭。^{[1]64}但桑德拉和古芭又指出，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阻力，到了18世纪末，女性不仅开始写作，还对父权制下生成的形象与形成的传统展开了严肃而激进的修正，而19世纪的许多女作家则按照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讲出所有的真理，但以倾斜的方式”^{[1]94}的策略展开修正。她们通过表象上的妥协，以一种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真正要表达的意义，小心翼翼地对比父权诗学进行颠覆。她们常采用的形式有：在叙事作品的表面情节和深层意义之间设计互为映照的结构；在女性主人公和作品中次要人

物之间、言不由衷的叙述者与作家本人之间隐含诸多极为微妙的联系。

在叙事作品的表面情节和深层意义之间设计互为映照的结构这一妥协又颠覆的方式中,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往往分为“天使”型和“怪物”型两类。与弗洛伊德有关本我、自我与超我的人格结构相对应,女作家在作品中塑造“天使”型的女性主人公体现的是女作家向男性中心社会的现实表现妥协,从而以合法身份幸存的方法策略,而“怪物”型女性人物的塑造则代表了女作家反抗男性中心社会的压制而产生的反叛与愤怒情绪。不同于男性作家创作的女性形象,女作家塑造的疯女人不单是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对手,更可能是作家的“重影”或“替身”,再现的是作家内心的焦虑与反叛欲望。女性作家这一妥协又颠覆的策略正是由于读者与批评家通常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天使”型的女主人公身上,忽略了“次要的”、“怪物型”的女性形象,而得以在读者和批评家的不知不觉中表达出女性作家的叛逆意识和“天使”型女主人公的愤怒与反叛欲望,进而也表达出女性作家对男性中心社会既妥协又有意抵抗的矛盾状态。

在揭示了女性作家的“作者身份焦虑”以及为克服这种“焦虑”而采取的“颠覆”策略后,《阁》著在第二、三、四、五部分随即展开了对具体作家及其作品的细致分析。第二、三、四部分分析了玛丽亚·埃奇沃思、简·奥斯丁、约翰·弥尔顿、玛丽·雪莱、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乔治·艾略特等经典作家的重要作品。第五部分则对19世纪的代表性女诗人如伊丽莎白·勃朗宁、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和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做了集中探讨,其中对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作品重点做了分析。

桑德拉和古芭特别以对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的解读为标杆,她们在“初版序言”中即说明了该著书名暗含了与《简·爱》有关的内容:“我们尝试进行上面提及的重新界定工作的最初努力,是伴随着对于夏洛蒂·勃朗特的仔细阅读的,对我们来说,她的作品似乎为许多不同的女性焦虑和活动提供了一种范式。因此,尽管我们努力想使本书大体上遵循根据作家的生平排列的编年体顺序,但是,夏洛蒂·勃朗特这位常常未能受到足够重视的19世纪小说家确实我们的

研究当中占据了一个中心的位置:通过对于她的小说作品的细致分析,我们希望能够呈现出一条新的路径,通过这条路径,我们得以对所有19世纪的妇女作品进行阐释。”^{[1]2}这就使第10章《自我与灵魂的对话:相貌平常的简的历程》成为全书画龙点睛的一部分。

桑德拉和古芭认为,《简·爱》这部作品戏拟了英国17世纪约翰·班扬的代表作《天路历程》中“基督徒”的朝圣之旅,描写了简遭受监禁、挣扎逃脱,最后走向独立自我的人生历程。同时两位作者重点解读了简·爱和伯莎这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她们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指出哥特式风格的黑暗阁楼正是女主人公理性与激情对立冲突的地方,被监禁在阁楼中的疯女人伯莎发出的古怪的喃喃声和简心中充满激情的声音彼此呼应。伯莎最后将桑菲尔德烧毁,恰恰是简潜在的反抗罗切斯特男性中心位置的反叛欲望,也象征着对男权的最终摧毁。疯女人伯莎实为简潜意识中反抗父权的另外一个自我,亦是被压抑的女性创造力的象征。

对《简·爱》中的双重结构、理性的女主人公和其激情的对应物“疯女人”之间关系的分析,不仅贯穿于19世纪女性作家玛丽·雪莱、简·奥斯丁、伊丽莎白·巴瑞特·勃朗宁、艾米莉·勃朗特、乔治·艾略特等人的作品,还贯穿于夏洛蒂·勃朗特的另外三部小说,为解读文学作品打开了全新的视窗。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两位学者常结合精神分析和神话原型批评等现代批评理论展开别开生面的分析,其结论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阁》著以全新的视角挖掘出了一种激进派女性诗学,同时也重新划分了英美女性的版图。然而,《阁》著的“革命性”力量离不开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两位学者独特的写作风格,其一往无前的文风、激进的豪情亦是其卓然之处。作品蕴含强烈的无法抑制的表达欲望,洋溢着两位作者自言的“审美快感”和一种急于对男性写作进行修正的“狂喜状态”。书中包含大量的引语、隐喻、相互交织的意象以及振聋发聩的标语口号,如她们著名的开场提问:“笔是对阴茎的比喻吗?”即足以使读者体会其语言的锐利勇猛。此外,书中的表达措辞准确且音韵丰富,其中出现了许多压头韵的妙语,如“父权诗学”(Patriarchal Poetics)、“作者身份焦虑”(Anxiety of Au-

thorship)、“性别与文类”(Gender and Genre)等等,此外还有大量押尾韵的长串列举,如“厌食症、幽闭症和广场恐惧症”(Anorexia, Agoraphobia, and Claustrophobia)等等。可以说,该著的每一页都证明,这是两位作者一次非常愉快的成功合作。

诚然,任何一部伟大的能够带来新思想的学术著作在饱受褒扬的同时也难免受人诟病。三十多年来,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发展,《阁》著也不间断地受到来自多方的质疑与挑战。如,在其出版6年后,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佳亚特丽·斯皮瓦克发表了题为《三个女性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的文章,尖锐地指出《阁》著对《简·爱》的解读剥夺了来自新印度群岛殖民地的伯莎的话语权,伯莎只能以简的镜像身份存在,简的幸福要以伯莎的最终死亡而实现,与此相似,“英美白人女性主义的权威亦是通过牺牲殖民地女性的利益建立起来”;^[3]另有学者认为,《阁》著在批判传统经典男性作家或文论家的女性歧视意识时,也遗憾地陷入了“女性本质主义”的泥沼,甚至还给人一种“她们笔下的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都很像是7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的感觉;再次,作为洋洋一部巨作,其讨论跨越整个19世纪的英美女性文学,若仅以一条线索将其串联,则难免会有削足适履之嫌。

但正如保尔·德曼所说:洞察力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定的盲目性。^[4]《阁》著固然存在一些瑕疵,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瑕疵又引起了新的学术讨论面向,不断生产出更多有意义的学术对话,所以也仍不失为其深刻影响的另一体现。还需指出的是,在评价这部学术著作时,我们不能将之与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割裂开来。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美国学者丹尼尔·卢赛尔的陈述中得到启迪。注意到《阁》著因为“本质主义、种族主

义、异性恋霸权和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5]等受到批驳,卢赛尔提醒道:《阁》著“出现时,对‘性别政治’的意义和系统的父权制压迫的讨论才刚刚起步,追求细微之处的绝对准确和精益求精几乎还是一种奢谈,这只有在开辟了新的领地、形成了新的理论方法之后才能关注到”。^[5]鉴于《阁》著出现的特殊历史阶段,我们对《阁》著应该一分为二地加以看待,并更多地将注意力投向《阁》著诞生以来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2009年,在美国出版的《〈阁〉著出版三十年》论文集中,有13篇论文对《阁》著及其影响做了深刻的评判和总结,这也成为《阁》著持久影响的又一佐证。

关于中文译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译者为之撰写了长达近两万字的译跋。译跋《标出那新崛起的亚特兰蒂斯》不仅对《阁》著的历史地位、写作缘起、基本结构、主要内容、批评方法、写作特色、启示与反思做了极为详尽的介绍和总结,同时以时间为轴,纵向梳理了国内学界对《阁》著已有的相关论述,并辩证地指出了《阁》著存在的一些缺憾之处。这篇译跋将为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阁》著提供重要参考。

可以想见,这部译著将成为国内女性主义研究学者的案头之作,对中国的女性文学与文化研究、英美文学研究和西方文论研究等均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阁》著还将启发众多中国读者学会“阅读潜在的信息,学会拉动散落出来的线绪,进而观察随之而来的其他绪线的拆散,思考那些非计划中的和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内容”。^[6]从这一点来看,《阁》著亦将有助于启发读者进一步培养批判性思维,它“不仅是走向女性主义文论的大门,也将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启发当代理论的方法和关切的对象”,^[6]进而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观念革新产生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象[M].杨莉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2] Showalter, Elaine. Gilbert and Gubar's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after Thirty Years(Review)[J].Victorian Studies, 2011 (4).
- [3] 欧阳月皎.重访与招魂——评《阁楼上的疯女人:三十周年评论特集》[J].中国图书评论,2013 (3).
- [4] 杨莉馨.成就与缺憾的反思:《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象》论略[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 (4).
- [5] Sternlieb, Lisa. Gilbert and Gubar's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after Thirty Years(Review) [J].Studies in the Novel, 2012,(1).
- [6] Homans, Margaret. Gilbert and Gubar's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after Thirty Years (Review)[J].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 2010,(2).

责任编辑:杨春